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郑观应



## 一、弃功名学商业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中国已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英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扩大侵略的目的，于1856年到1860年间，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4年的侵华战争。英法联军在中国沿海国土上横行骚扰、肆意破坏，逼迫清政府再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同时，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同清朝反动军队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时候，一个知识青年在他的家乡试图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途径——科举，以达到他将来发迹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秀才没考中，只好到上海去学习他不想学的商务，干他不想干的外国洋行买办的职务。这个青年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郑观应。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待鹤山人，或罗浮待鹤山人。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人。中年以后迁居澳门。出生于1842年7月24日。他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个具有地主绅士身分的乡村私塾先生。据郑观应介绍，其父颇有学识，虽没有取得功名，但他对家乡的公益之事，如修桥架梁、赈济灾民，从来都是热心支持的。生长在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的郑观应，有着科举发迹的愿望，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有“买办故乡”之称的香山县，离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澳门本来就是香山县的一角，距雍陌乡更是近在咫尺。在鸦片战争前，香山居民中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者就很多，经商致富的人也不少，充当外国洋行买办的人自然也比其他地方的人多，郑观应的家族亲戚中当买办的人就不少，这些为他走上此路提供了方便。此外，郑观应的兄弟姐妹很多，如果他要继续学习，经济困难是较大的。1853年16岁的郑观应在父亲的严令之下，毅然弃科举学商业，走上了一条与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郑观应幼时跟随他父亲饱读孔孟之书，据他的老朋友回忆说他“幼读书，有大志”。从他一生的言行中看，都是以“救世”为己任的。他的家乡位于外国侵略者的巢穴——澳门之旁，又隔着珠江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遥遥相望，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不能不有所感触，为将来以“救世”为己任打下了感性认识的基础。

## 二、买办生涯

1858年，也就是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的那一年，郑观应远离家乡来到了上海。上海开商埠虽然只有十几年，但它是通商五口（其它四个城市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中最为繁华的一个港口，这里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据点——洋行，已经有很多了。在洋行中充当买办和工役的人有不少是香山人，其中就有郑观应的亲友。他正是依靠他们的帮助提携才站稳脚跟并继续发展的。他来上海后，先住在叔父郑廷江处，郑廷江是英商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他帮助叔父做事获取微薄的收入，叔父提供他住宿并热心地教他英语。他正是在新德洋行期间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直至老年还念念不忘叔父对他的帮助。

到上海的第二年，他通过姻亲和至交的关系，被介绍到英商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宝顺是当时营业额较高的一流大洋行，介绍他来的亲戚朋友在这里是管总帐的一等买办。因有这层关系，郑观应一进宝顺就取得了一定的地位。1859年冬，他跟随宝顺的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务，表现良好，由此得到信任和重用。1860年返回上海后即开始在宝顺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等事宜。从此开始他的买办生涯，时年18岁。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并不是很得意，始终只是管理丝缕和揽载等事务。1865年后几年间，由于洋行逐渐增多，竞争激烈，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等原因，宝顺生意清淡，股东群起折股，营业到处收束，1868年宝顺停业，他也就失去了买办的位置。

在宝顺10年中，他除做买办分内的事务外，也开始兼做一些生意。出宝顺后，即当上了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不久与卓子和一起承办了这个茶栈。茶栈的业务主要是代两湖、江西和徽州的茶客沽茶。后来因各地茶商欠款太多，影响周转，恐欠款愈来愈多有倒闭的危险，郑观应于1871年主动将其停业。

在经营茶栈的同时，他还与别人共同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和荣泰驳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名为华洋合营，但实际权力操于外商之手，郑观应虽为“董事”，却没有实权，但从中获得了经营航务的经验，同时反对外商侵犯华商权益的心情也强烈起来了，同时，个人资本也有了相当的积累。

1872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原宝顺洋行气拉渡号轮船船主麦奎因当上了该公司的总船主。麦奎因与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共事多年，早就对郑很器重，于是请他到太古总理一切。1874年2月间，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3年的雇佣合同，受聘为太古的总理兼管帐房、栈房等事，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他对办好轮船公司总结有10条经验，主要是用人得当、加速船运周期、降低消耗、多揽客货等。为了加速船运周期，应该运走的货物必须预先准备好卸货上货的扛力和一切必要的设备，以便船到不耽搁在码头上，就很快开航。这点和今天的“提高效率”完全一致。为了降低消耗和运输费用，必须购置烧煤少、行驶速度快、装货多的新式轮船。至于多揽客货则是决定

性的一环。他的做法是：选择商货多而且可靠的老顾主，或贴补房租，或专轮运送，用一些优惠政策招揽顾客。由于一系列的措施配套且行之有效，保证客货两旺，船到即可及时装卸货，从不放空船，保证了船运周期的缩短，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极大地加强了在船运行业的竞争能力。由于经营得法，太古盈利较多，发展较快。1877年合同期满时，太古又聘请他，继订了5年合同。

郑观应还在长江各口岸乃至沿海一些口岸开设一些为太古服务的揽载行，主要有：长江各口岸的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天津源泰揽载行，福州宝泰揽载行。此外，他还开设了川汉沪仁泰昌杂货号和恒吉钱庄等商业、金融机构。

郑观应一生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这在宝顺期间就有明显表现。工作之余，和同乡一起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课，专攻英文2年。通过学习，不仅英语有了较大提高，而且比较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认识到学习外国语的重要性。只有通晓西文，才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通晓西文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改革社会以达到富强的工具。

### 三、成为民族资本家

多年的买办生涯和独自经营商业，郑观应赚了很多钱。因此，他不满足于仅仅经营商业，而且想投资于近代工业。他在太古洋行做买办期间，不仅投资于太古轮船公司，而且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也有“股份”。此外，他在开平矿务局入股后，还积极联合盛宣怀等人集资开采山东登州、莱州、青州、莒州和东北锦州等处五金矿藏。还于1882年主持筹集股金开设造纸公司。1878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开办的津（天津）沪（上海）电线，他都有不少股份。郑观应的资本愈发展，追求利润的欲望也愈加强烈。鉴于中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追求更多的利润势必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权益发生更大的矛盾。特别是当资本从流通领域转投于工业生产时，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就更大了。郑观应已拥有数以万计的巨大资本，而且不少是投入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对立物的近代工业企业的，他已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了。从他后来力主中国人开办公司企业，收回利权，并身体力行，付出半生心血来看，更能说明这一点。

民族资本家开始产生之时，就对清政府存有幻想，郑观应当然也是这样。他逐渐与清政府官员与仕途发生了联系。1869年在安徽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1878年前后，山西、直隶、陕西、河南等地灾荒严重，民不聊生，郑观应与江浙仕绅盛宣怀、经元善、严作霖等人，在上海设筹赈济所，筹捐赈济晋、豫、直、陕等地灾民，并将母亲陈氏遗留下来的1000两银子也捐赠了。因此清政府授予他道员，官衔已经不小了。后来，以郑观应一家捐赈有功，由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的奏请，清政府准许郑观应在香山家乡树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并将有关人的姓名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可见，虽为洋行买办的郑观应，已与社会名流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与权倾朝野的大官僚李鸿章一类人物发生了联系，而且初步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这些都成为他日后跻身洋务企业和发展个人资本的有利条件，为他摆脱买办职位奠定了基础。

#### 四、以商战为主的改良主义思想

当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任买办之职，自己经营商业、航运等企业的时候，也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之时。作为一个拥有爱国之心、民族之义的民族资本家，郑观应不仅本能地愤慨外国侵略者贩卖中国人出洋为奴，侵占中国疆土的恶劣行径，而且从自己经营商务的实践经济中认识到，影响、阻碍他进一步发展资本的，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他虽然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依赖生存的一面，但对外国侵华势力、外国商人的“喧宾夺主”深为不满，为保证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为维护自己商业的既得利益和今后资本的发展，郑观应一生都在努力积极地寻找对付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初则学商于外，继则与外人商战”，即开始向外国人学习经商之道，随即与外国人开始进行商战来保证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利益。他不仅在经济上要与外国人进行商战，而且在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思想方面，也在寻找抵御侵略和救国救时之良药。这些都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救时揭要》和《易言》各书中。

《盛世危言》的版本有 20 多种，可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它多数是在 1895 年以后维新运动高潮中，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而刊印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这本书刊印之时，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礼部尚书孙家鼎、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几次把此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刷印 2000 部散发给大臣们阅读。郑观应自己也曾排印 500 部，很快被索求一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盛世危言》之所以出现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是与它“富国救国”的主题分不开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广大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愿望。由于强敌压境，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保卫疆土、御外防侮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郑观应适应形势的要求，把御外防侮放到了首要位置，说“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它不仅与清朝顽固派“先安内而后攘外”、“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论调大相径庭，也比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治中驭外”思想先进得多。他认为凡对侵略中国的列强，部应予防御，但重点应该防俄，并提出了在自强的基础上联英、日以拒俄的策略。之所以要以拒俄作为战略重点，是因为沙俄世代执行波得大帝征服亚洲的政策，所以对中国来说，沙俄是最危险的防御对象。

郑观应毕竟是商人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在重视兵战的同时，更注重商战，甚至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战之胜，重在防御，而有效的防御在于强兵。他从来不孤立地谈强兵，而是把强兵同社会政治、教育制度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联系起来考虑。只有这样，兵才能真正强，才能达到不通过战争而消灭战争的目的。郑观应把强兵概括为“人”和“器”两个要素，

而“人”的培养在于教育，“器”的关键在于发展近代工商业。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能致富，生产自己军队所需的新式武器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竞争。所以要达到真正的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自强的基点就应该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即放在“商战”上。

所谓商战，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行斗争。商战要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洋商平等的条件下，制造出成本低廉的产品。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使用先进的机器技术是关键。关于机器的来源，郑观应主张购买与自造并举，但应自造为主。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不会制造机器，往往要价极高，而且经常以用过的旧机器卖给中国，中国经常吃亏上当，遭受欺骗。因此，只有真正解决了自造机器这个难题，发展民族工商业才有前途。这种发展民族机器制造工业的见解，在当时是不多见，是先进的。

他凭着多年经营近代工商业的经验，深知要使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仍能保持低廉的价格，还须降低生产管理和流通过程中附加于商品的一切费用，对此又提出一系列降低商品价格以加强竞争能力的意见。

第一、按照商人的要求办企业。郑观应在原则上是反对“官督商办”的，但为了避免地主豪绅的阻挠和吏役的勒索，如能取得官方的保护，也同意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然而，清政府搞的“官督”，不但没有帮助商人，而且是阻挠了正常的商业活动，使企业俨如官僚衙门。针对“官办”的种种弊病，从而提出完全商办的观点。从原料购买到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销售市场，都尽可能地减少费用和加快资本周转，以便获得更多的赢利。他说商人经营较官办优点多，因为商人视企业为身家性命、生存竞争的依靠，自然比官僚努力用心，因此在选举商董和管理方面，也应采取民主办法，由选举而产生。商董选出以后，组成管理机关，定期召开商务会议研究业务，共同决定。政府再依靠商人的原则给予支持，这样上下通气，官商配合，中国商务不会没有发迹展图之日。

第二、在流通领域中，除降低流通费用外，郑观应对于铸造简便的通货和创办银行，以促进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也很重视。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没有便于携带和交换的铸造主币、辅币、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铸币”是关键的一步。银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旧式的钱庄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建立银行，不但能代替企业筹措资金，促进资本流通，而且可避免洋人乘中国商务资金不足而牵制国内近代企业。他这种把创办银行放到商战的重要地位上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是符合商业规律和社会进步发展的。

第三、在税收上平等。多年的商业活动使郑观应逐步认识到华洋货物在税收上的不平等对商战胜败有极大影响。外国商品只纳关税和子口半税，即可“遍运天下”，而中国商品却要在纳税之后，遇卡抽厘（厘金），这致

使中国商品成本大大高于外国商品，难以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相竞争。为了加强民族工商业产品的竞争能力，提出了“裁撤厘金，倍增关税”的主张，使华洋商品具有同样的税收。其次是必须收回海关权。在海关担任重要职务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处处保护洋商，刁难华商。所有这些都使近代企业无处不受制于清政府的官僚腐败、税收的不平等、外国商人的竞争压迫、海关的歧视偏袒，这样恶劣的商业生存环境，刚刚诞生的近代工商业如何能生存下来呢？

商战的胜利，在华洋双方税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科学技术人才的水平的提高。因此，郑观应总是把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放在首要位置，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办法。

首光是学习西学。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所谓“天学”，是指天文、天体、气象等学科；“地学”是指地理、地质、矿产、农业、林业等学科；“人学”是“以方言文字（外国语）为纲”，“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这种分类法，已经改变了过去一般西学论者专注于科学技术的狭隘看法。但他所主张应学习和列入考试科目的具体内容，除了各国史地、政事、律例之外并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内容，至于西方哲学则完全没有提到。郑观应毕竟是商人出身，特别重视兴办企业和对外贸易。书中在讨论考试出题时，专门谈到铁路、轮船、矿务、邮政，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等。为了广泛地推行西学，使大家都便于学习，郑观应非常强调精通外文，认为数十年来，中国人之所以不能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原因就是文字不通。他切身体会到看翻译书和直接看原版书是大不相同的，一是翻译书往往有词不达意，似是而非的现象；二是翻译过来的书极少，远远满足不了学习西学的要求。所以仅看译书不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西学。以一鳞半爪的知识如何能与外国人相抗衡呢？

郑观应虽强调学习西学，但反对鄙薄民族文化的全盘西化论。既要打破积习使人们重视西文西学，还必须保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特性，设立新式的培养人才的学校和废除八股科举取士的制度，加速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他不仅提倡，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去做。在总办汉阳铁厂期间，深感技术人才不足，在铁厂建立了一座结合机器生产的大学堂。在这个学堂里，采用了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半工半读的方式。边学边练，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于将来达到逐步代替洋人的目的，这样，把人才培养和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并和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联系起来。

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平等税收，培养新式人才固然很重要，但要实现这些主张，必须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就是他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要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必

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在郑观应心中就是有一定民主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与之相适的一系列内政改革。

开设议院实行立宪，是郑观应的一贯主张。早在《易言》中他就说过，实行议政制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脱离半殖民地的惨状。在甲午战争以前像郑观应这样激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议院制的，还没有第二个人。为了保证议院制的实施，他在内政其它方面也有建议，如吏治、教育、用人、刑法、办报、盐务、漕务、治河，乃至救灾救贫等方面，都有详尽的论述。

在君主立宪条件下的议院制，是君民共治的一种体制，它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使君民之间得以沟通。要真正做到民情能达于上，必须广办报纸。有了报纸，工商之衰旺，官员之过失，民间之隐患，君主之意图都能直言不讳，为中国人民所熟悉，起到“劝善惩恶，兴利除弊”的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只允许外国人办报纸，而禁止中国人办报很不公道，这样只能是扩大和加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与富国民强背道而驰。

郑观应还对清政府用保举之法选拔官吏以猛烈抨击。用这种方法不仅助长了贿赂徇私，而且难得才德兼备之才，如此，吏治怎么会不坏呢，所以官吏和议官必须公开选举。同时，为了保证实行议院制度，搞好内治与吏治，还必须做到年老让贤和裁汰冗员，做到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节省经费，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大有好处的。

郑观应对侵略者的认识也有了不少的进步。《易言》开头第一篇就是《论公法》，犹把公法的作用说成各国借以互相维系、规劝、制约的法律。他天真地认为，公法一出，各国都不敢肆意妄行。后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烟台条约开始的一系列新的侵略，郑观应开始认识到公法不像他原先所想的有用。因而到著《盛世危言》时，他在书中愤慨地诘问：为什么中国已经采用了公法，还是要被西方国家欺凌？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待中国并不照公法办事？于是他改变了对公法的看法开始怀疑侵略者以老师自居的骗局，认识到公法只是对“强者”（侵略者）有用，若是中国仍旧“积弱不振”，虽有公法，与事无补。

《盛世危言》在变法运动时期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因为这部书不是单纯地介绍西方，而是针对中国实际的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他主张不但要注意“兵战”而且要注意“商战”，并且指出外国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是同样的甚至有更大的危险。他对侵略者的罪行和统治者的腐朽都有不少的揭发，并且激发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从这部书本身，虽然不可能得到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但它在人们寻找真理的途径上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变法运动时期，维新派较激进的思想家们从哲学和政治基本理论上提出不少进步的见解，但无论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都没有写出一部讨论中国各方面实际问题的著作。和《盛世危言》性质相同的书籍，如陈炽的《庸书》等，内容和见解也都不如它，吸引力和社会效应也小。因此这部书在当时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小的。

## 五、投身于洋务企业（一） ——织布局、招商局

1881年前后，郑观应从外国洋行买办到洋务派所办企业中任职，这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点。郑观应既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但又屈居买办的地位；既不满意洋务派官僚的一些倒行逆施错误做事，又力求得到洋务派官僚的赏识。这使他在去留问题上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

郑观应交际范围很广，在他做买办期间，不仅与社会名流王韬、盛宣怀等人关系密切，而且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大官僚也搭上了关系。与盛宣怀、李鸿章的密切关系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和活动。李鸿章对郑观应，一方面由于郑发表《易言》等著作和经营商务的声誉，早已耳闻其名；另一方面郑观应办救灾救济很有成绩，尤其对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的救灾出力很多，李鸿章自然对他更为青睐。加之郑观应的同乡兼同宗、当时任洋海关道的郑藻如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他在李鸿章面前极力为郑氏美誉，郑观应同洋务派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李鸿章倚为左右手的盛宣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大兴勘矿，想在近代工商业方面有所作为，打算借助郑观应办近代企业的经验进而加以力荐；郑观应也想借盛宣怀及其父盛康的关系踏入仕途，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相互依靠、相互利用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最后。

洋务派官僚的确对郑观应很赏识。他还在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时，就被委派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了。1881年，李鸿章认为他才识并优，条理精密，一直被中外商民所佩服，享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于是委任他为上海织布局总办。1881年5月20日，李鸿章又委派他担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他以一个洋行买办的身份兼任洋务企业的要职，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之所以出现这种交叉现象，一方面是他既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行企业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又同国内的官绅、买办商人以及旧式商人等大量资金持有者有广泛的交往；既了解外国的机器技术水平和商业行情，可以方便地引进外国技术，又能在国内广筹资金，例如他在织布局所招股数最多。另一方面，郑观应在经营近代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才干，实为凤毛麟角，确不多见，故被中外各商家所倚重。

郑观应一方面任洋行买办，同时又兼任织布局、电报局总办，除偶尔一些人事关系麻烦外，并无太大的困难。但当需要他脱离太古买办职位就任上海轮船商局时，他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1882年2月，当与太古合同期满之后，他决定不再续订，3月25日接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委派，30日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把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一职交给了经元善。

郑观应最终放弃太古而就商局，主要原因是：一、爱国之心起了巨大作用。这时的郑观应，民族资本家的立场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已很鲜明，发展中国航运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认为招商局如果不早日整顿，恐难维持，

这样我国就无轮船往来于各通商口岸，更加受到外国人的欺侮。从挽回权利的爱国心情出发，于是毅然离开太古洋行来到招商局。二、郑观应与太古的矛盾也很深。他认为自己有功于太古，对创办轮船公司有贡献，为了公司自己吃亏很大，太古却不肯弥补他的损失，太古是有负于他的。其实，以郑观应一个民族资本家而且具有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人，同买办一职也不会长期协调，终究会产生矛盾。第三，薪金收入有了保证。此外，他在招商局也有相当一部分股份，到招商局任职也可保证其财产的价值。

脱离洋行买办职位，到中国自己创办的企业中大展宏图，从此以后，郑观应满怀信心地将自己富国强兵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将自己经营近代工商企业的丰富经验和才干发挥出来，在中国求富求强的道路上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早在 1878 年，郑观应协助彭汝琮筹办织布局时，他就向彭汝琮提出了用人谨慎、应让有限的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办厂规模要从小至大脚踏实地地前进三点正确意见。在实际工作中，郑观应也基本按着招股、购机、买地、建厂等步骤循序而行。但彭汝琮处处摆起官僚的架子根本不按规矩办事，要么武断独谋，要么不执行大家的意见，弄得郑观应筹垫了万余金也不能挽回败局，只好向李鸿章辞职而去。

1880 年郑观应再次进入织布局，首先就抓了三个问题。用人、筹款、立法。为了加强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能力，降低成本确保盈利，除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之外，郑观应还向清政府提出两条建议：一条是减税兑厘。机器织布局的产品要能与外国商品相竞争，必须在厘捐上享受与洋货同等的待遇，认为这是中国保护商民的有效措施。另一条是稟请清政府在 15 年或 10 年之内，通商口岸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另设纺织厂。这虽然有压制其它民族工业发展之嫌，但在“防外人争利”方面确实也起到了作用。郑观应投身洋务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发展自己民族经济企业，提高中华民族的经济力量。他本来是不想当织布局总办的，但考虑到这是关系到“利源外夺”的问题，如果办不成功，只会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贻笑于洋人，所以他一定要殚精竭虑，力战到底。

郑观应经营轮船招商局也很有成绩。洋务派之所以要把任太古买办的郑观应请来专任帮办，有几个原因：一、1877 年招商局与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订齐价合同后，1879、1880 两年的经营额有了显著增加，但 1880 年后怡和、太古又暗中削价，致使招商局亏损颇大，再次处于不利地位。鉴于郑观应在太古总理船务，与各行往来熟悉，拉他过来专办揽载等事宜，于竞争有极大的好处；二、这时原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已专办开平煤矿，无暇顾及招商局；1881 年新委派的帮办张鸿祿又经营海运漕米，徐润一个人总办局务是忙不过来的，熟悉船务，与洋务派关系良好的郑观应是理想的人选。三、1880 年，以顽固派王先谦为代表，参劾招商局“糜费营私”贪污受贿，致使商情涣散；而当时招商局又正急需扩充新股。因此，与资金持有者素有交往，熟悉商业

情况，为众商信服的郑观应是稳定商情、扩大股源的理想人物。基于众多原因，招商局聘请郑观应是合情合理的。

在郑观应入局时，招商局百两票面的股票价格，已从 1879、1880 年的 140 两跌至 1881 年的 30 余两、1882 年的 40 两之间，局面几乎维持不下去。郑观应偕唐景星与怡和、太古交涉，于 1883 年签订了为期 6 年的齐价合同。其具体分派方法是，长江生意：招商局得 38 分，太古得 35 分，怡和得 27 分；天津生意：招商局得 44 分，太古得 28 分，怡和得 28 分；其由北洋来往南洋各口岸之船只，招商局派 11 号，太古派 12 号，怡和派 7 号，禅臣派 4 号。合同规定 3 个公司所得银两，以船之吨位、里数快慢统算生意均分，同心合力，不得实行跌价以揽挣生意。由于这次齐价合同，水脚招商局占多数，从此股票大涨，每股已到 160 两，为此李鸿章晋升郑观应为招商局总办。

在用人问题上，郑观应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未入招商局之前，他就说用人的对错是关系到商局兴衰的大事。因此主张各招商分局总办及总局经理宜定期更调，因为凡在商局工作日久，虽然工作熟悉，但与同事关系日久生情致使相互包庇，不敢泄其错误，不利于招商局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对于中层领导必须量才录用，如有过失，虽为总办的至亲至友，也当立即辞去。而对有才之人，无论何人推荐，随时选用，不得有任何牵制。

郑观应还严格对待降低消耗、加速轮船转运、增加赢利的问题。在降低消耗方面，他首先着眼于降低煤炭的消耗，每船 1 昼夜节省煤炭 1 吨，每月约行 15 天，每年可省煤 180 吨。统计 30 只船，每年可省 5400 吨，每吨 4 两，合计可省银 2.1 万余两，数目相当可观。他还特别注意加速轮船周转，减少码头停靠时间，轮船停泊 1 日，每船用费除煤价外，共需 150 两至 180 两。如果每条船在每个口岸每次多停 1 日，每月就要多耗费白银六、七百两，以全局 30 船统计，每年需多耗费 200 万两。招商局船只在汕头停靠时间比太古船时间长，即以每船每次最少多停半天计算，每月 14 次，每年每船需多停 24 天，等于少走两次船，虚耗资金 5000 两。以全局船只统计，所耗资金不下 10 万两。减少轮船在码头停靠的时间因素很多，其中关键是把货物招揽充足和事先准备好装卸，因此平时把招揽客货的工作做好，如果能堵决这一浪费，为招商局就节约了很大的一笔开支。

可见郑观应很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懂得如何发挥资本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反复说明资本周转愈快，创造剩余价值的次数愈多，资本的作用发挥得愈充分。郑观应要求加速船运周转，也就是提高资本周转率，企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

1890 年太古、怡和、招商 3 家 6 年齐价合同期满，怡、太两家削价竞争，加上其它轮船公司船只的争载，招商局的票面从 100 两跌至 60 两。尽管 1892 年 3 家又签订了 5 年齐价合同，但纠纷仍然不少，怡和、太古还有反悔之意。商局生意冷淡，人心涣散。作为督办 的盛宣怀再次想起了善于经营船务的能干老朋友郑观应，邀请他二入招商局。从 1892 年 12 月 6 日到达上海再次

接手招商局到 1903 年离开到广西去做官为止，这 10 年是郑观应工作顺利，生活安定，情绪高昂，春风得意的 10 年。中间虽曾兼过汉阳铁厂总办等职务，但工作基地仍在招商局。

1890 年初招商局与怡和、太古 6 年齐价合同期满后，怡、太就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上海走天津方面，太古原为 28 分，1892 年订的草约规定为 32 分仍不满足，定要增加为 33 分。怡和也有类似的过分要求。郑观应到局就任的第二天，就与陈猷去太古询问和约之事。他认为坚决不能在貌似强大的对手面前气馁，坚决不能再让步。经过多次论争，终于抵制了太古、怡和提出的一些苛刻条件，争回一些权利。招商局的股票价格又从每股 60 两涨至 140 余两。谭国忠等董事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1892 年的招商局盈利日厚，大有起色，虽不能说完全是郑观应的功劳，但他的功劳的确不可埋没。

在外部同怡和、太古搞好交涉和斗争，是办好招商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使这种交涉和斗争更加有效，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调整好内部管理。为此，在进局不到两周内，即拟定了《整顿招商局十条》，送呈盛宣怀。其主要内容是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不久，又写了《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14 条，内容大同小异，现详细介绍于下。

第一、出售过时旧船，添购适时新船。郑观应从多装载、减消耗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利润率出发，主张把载货少、吃水深、烧煤多的“老弱病残”者忍痛贱价卖掉。趁最近船价贱价之时，赶造二三只载货多、吃水浅、烧煤少的大船。建造新船，须将自己设计的船样，直接寄到外国船厂问明价钱，招人投标承造，然后签定合同，这样可以免洋人经手从中渔利。

第二、把船舱改装成适应客载的要求。由于招商局轮船装货船舱的设备不如别的轮船公司好，有些生意被别家抢去了。郑观应决定改装船只，虽然需要支出一笔相当数目的改装费，但改装后能够多揽客货，且减少一些特种货物破损赔偿费用，仍是合算的。

第三、广泛招徕人才，尤其是那种揽载行或大公司的熟悉生意之人。郑观应认为，这是招徕生意的好办法。由于揽载行和大公司当家等人对于客商把货物交哪一家轮船装运，具有决策的权力。他建议将各分局总办之职，让这些能拉来货源的人担任，不用官府推荐的对生意无利甚至有损害的人。

第四、轮船往来周转调度得法。招商局轮船较多，要避免空船来去、或半载而回的现象，调度是至关重要的部门。例如，他恐怕运漕米的船空载回沪，提出运漕船天津卸货后不立即回上海，而去牛庄装上货物之后再回。因牛庄需要南运的货物很多，其中豆饼一项就尽够装运的。郑观应对货物流向了解很清楚，不但清楚每年由牛庄运至汕头的豆饼有 400 万片，而且知道汕头一般不愿在同一时间涌至过多的豆饼，为避免招商局船把豆饼运至汕头有空船回沪之虞，可以先运至上海再继续运至汕头。

第五、要整顿商局，改善经营管理，必须积极培养人才。只有有了人才，才可能与人争高低。他认为招商局应该创设驾驶学堂，轮船由中国人自己来

驾驶，改变局船长期由外国人驾驶的怪现象。于是，他将买来的泰安船改为教练船，先招学生若干名学习驾驶方法；继则正式成立驾驶学堂，聘江裕轮船经理美国人鼎德为学堂总练习。但遗憾的是，自己独立驾驶轮船的人才还是没有培养成功。

这一时期，郑观应的工作顺利，情绪高昂，将富强救国的愿望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实施起来。除了出色地经营、整顿招商局外，还为所著的《盛世危言》的定稿付印作准备。此外，他这种热切的事业心，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孙中山的富强救国行为的热心支持上。

郑观应与孙中山同为香山县人，两家相距仅 30 里。1890 年前后孙中山与郑观应开始交往。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国富民强的思想，而且在医学方面也有共同的爱好。1894 年 6 月，孙中山到总理衙门办护照出国考察，并打算上书李鸿章，幻想通过李鸿章来实现他的救国救民主张。郑观应表示热情支持，并为孙中山写了封热情的推荐信，介绍给盛宣怀请求转荐。从信中可以看出，郑观应的富强救国的心是火热的。

## 六、投身洋务企业 二 —— 上海电报局、汉阳铁厂

郑观应在上海电报局任职时间不久,仅从1881年5月20日至1882年春近1年的时间,但他对电报建设还是很有功劳的。他办电报的目的是为了挽回利权便于商战。在架设津沪电线之后,即和经元善、谢家福等人奏请架设长江、闽浙等处电线,以利商务。在给两江总督左宗棠的禀文中讲道,外国商人从上海至外国有万里之遥,而消息在瞬间即可沟通;而中国商人从内地到上海,有的不过几百里路程,消息却迟于外国商人,致使蒙受经济损失。因此,电线对于商战有极大的关系。

然而,当计划呈请两江、湖广、闽浙等督抚批准时,遇到了阻力,特别是受到左宗棠的阻挠。向来重视学习西洋技术的左宗棠,忽然宛如一个道地的顽固派,这其中是别有原因的。左宗棠的批示不过是一种藉口,他的本意是不肯把长江电线让淮系集团插手,而是要交自己集团中长期办洋务的胡雪岩去办。在湘、淮派系斗争中,郑观应似乎是一个不偏不倚者。通过左宗棠的左右手、洋务局头头王之春疏通左宗棠的左右干将,然后说服了左宗棠,缓和了两集团的矛盾。不但架设电线的要求获得了批准,而且郑观应还得到左宗棠筹办长江电报事宜的委任状。

郑观应在经营电线方面是很有远见的。鉴于津沪电线通成后,报费很贵而效益很少。在长江、闽浙架线兴工时,他就提出首先要培养中国的电话人才,其次才是添招股本增加电线。电报业在创始之初,所用人才都是外国人,工资就是一笔极大的开支。加上水陆电线、机器、磁碗、纸张等器材,又都是从外国购买,所花钱财不计其数。郑观应认为必须培养人才来代替洋工,自己设厂制造电线机器等材料,减少从外洋购买,从而做到减电费、扩大营业、增加效益。因此,他在提出办电报专门学校之外,还计划各分局招收学徒,在打报等实际工作中培养;另外,考选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机器、水陆电线、电气等专业,然后回国自行设厂制造。按照他的设计,电工聘用华人,器材自己制造,线路必能迅速推广,报费即可大大降低,盈利必将日渐增多。

汉阳铁厂是湘广总督张之洞于1889年开始筹备,1891年动工兴建,1893年投产出铁。它兼采矿、炼铁、开煤三项,实际上是一个官办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当时是东亚最大的钢铁企业,但由于厂址同原料、燃料产地相距较远,运费昂贵,经营管理不善,销路不广等众多原因,投资颇大,收效极微,搞得张之洞心力交困,一筹莫展,只好招商承办。这个“商”就是盛宣怀,他于1896年5月24日接办,随后就请他多年的老朋友,善于经营近代企业的郑观应去做总办。

在盛宣怀接办铁厂后的第8天,即1896年6月1日,郑观应奉北洋大臣和两湖总督的委派,走马上任了。当时他最大的顾虑是就任铁厂总办会失去招商局帮办的职务。因为招商局是肥缺,而铁厂是苦差事。盛宣怀知道郑观

应的心事后，即向他保证不会让他失去招商局职位。郑观应一方面碍于盛宣怀的情面，另一方面他已认识到“煤铁于今世界用途最大”的道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便欣然前往就任了。

郑观应刚一上任，即向北洋和两江总督提出了三条关键性意见：第一，解决焦炭来源问题。铁厂需要焦煤，如同人需要谷米一样。为此他化费了很大力气。到 1896 年秋冬之交，基本上保证了焦炭的来源。按规定，各处运至汉阳的焦炭，萍乡广泰福每月 2000 余吨，郴州每月 1000 余吨，开平每月 1000 余吨，每月共可得 4000 数百吨。汉阳铁厂如两炉同时运转，月需 5000 余吨。本来只开一炉，还因焦炭不能常年供应而时有停产，现在供应的焦炭距同时开两炉所需已相差不多了。

第二，培养人才问题，首先他对外洋聘请来的技术人员作了全面的了解。当时汉阳铁厂有外籍技术人员 25 名，他认为这些洋人不但品格有问题，而且技术水平也不高，其知识手艺还赶不上翻译过来的书中所讲的那些，把他们当作管理工程的人员使用是不合适的，只是在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未培养出来之前，还须聘用洋匠。他在暂时聘用外国技术人员的同时，积极着手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他计划设立学习机器的书院，利用厂中技术人员教授徒弟，为将来代替洋人打基础。到那时，薪水可以大大减低，钢铁成本自然降低，还免去了受洋人技术上的挟制。他认为这种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堂比上海、天津设立的学堂有效得多。同时，他还主张派有实际经验的工匠去外国机器厂学习，加快缩短与国外技术上的差距。

第三、解决销路问题。无论是“觅焦炭”，还是“选人才”归根到底是为了扩大钢铁及其制品的销路。没有广阔市场的开拓，汉阳铁厂是维持不下去的。一开始，汉阳铁厂的销路预定以芦汉、粤汉铁路的钢轨为大宗的，张之洞还奏请朝廷明文规定，凡有国家筹建项目的钢铁用料，一律须向汉阳铁厂订购，不许再订购外国钢铁，以保证铁厂的销路。郑观应比张之洞高明，知道单靠行政命令并不一定能做到路轨必从铁厂购买，而是必须把铁路修建权操于自己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为此，他多次督促盛宣怀控制铁路的修筑权。多年以来，郑观应和盛宣怀有着个人利益和事业上的紧密联系，盛宣怀把郑观应看作自己经营实业的得力助手，郑观应则把盛宣怀看作自己在《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理论主张的知音和实现者，是实现自己富强救国主张的依靠人。

郑观应这种善于抓主要问题并加以逐步解决的实干精神，在当时的思想家和实干家中是罕与匹敌的，这必然遭到平庸之辈的妒忌，首先就为张之洞所不容。他对汉阳铁厂的整顿改革初见成效后，颇令张之洞觉得这使他斯文扫地，颜面无光，便处处与郑过意不去。1897 年 3 月 15 日，有一署名“张某”者，在《苏报》上发表题为《总办其人》的文章，对郑观应大肆毁谤和攻击，致使郑观应心灰意冷，加上他做事多受牵制，被人排挤，许多抱负无法实现，因而多次提出辞呈，终于 1897 年 7 月 21 日将汉阳铁厂交给盛春颐。

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织布局，电报局都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近代型官办企业，它们都是以抵抗外国商业入侵为目的而创办的，具有爱国性质。郑观应抛弃洋行买办的职位，投身于此，并为其发展、壮大做出较大贡献，都是他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 七、中法中日战争中的爱国行动

正当郑观应积极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并初见成效时，发生了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一向以救国为职志的郑观应，在强敌压境之际，采取了积极抵抗的态度和行动。还在 1883 年，他曾向老朋友、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处善理湘军营务的王之春表示，愿为抗法之战洒一腔爱国之血。王之春把郑观应推荐给彭玉麟同时，郑观应也致书彭玉麟自荐。

1884 年 3 月 22 日，郑观应奉彭玉麟委派，总理驻琼州（今海南岛）兼署雷琼的湘军十四营务处的事宜。据他说，总理营务处事务并非他的本愿，他是想利用他和南洋一带的亲朋关系，到那里侦察敌情，并密约那里的壮士联合袭击法国侵略者。这时清军在越南战场上节节败退，法军侵略军已占领红河三角洲并到中国凉州进行挑战。抵抗派彭玉麟和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为了挽回败局，想袭击西贡（今越南河内），铲决法国储粮之地，奏请清政府派郑观应前往南洋侦察敌情，以便寻找机会给法国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

1883 年，郑观应曾经为了整顿和发展轮船招商局的南洋航业，亲赴南洋考察业务，对那里的人员，情况都比较熟悉，而赴南洋侦察敌情也是他的宿愿。因此，任务虽然很艰巨且有极大的危险，他仍乐于前往。1884 年 6 月 11 日郑观应拜别彭玉麟，坐保安轮船于第二天到达香港。随即附搭法国轮船离开香港，于 6 月 16 日到达西贡。在作了一些布置后，即于第二天 6 月 17 日乘船前往新加坡，与事先预定帮助策划的陈金钟相见。陈金钟是中国人，任暹罗（今泰国）驻新加坡领事兼中国轮船招商局新加坡分局总办，本来对郑观应此行的活动抱不支持的消极态度，但在郑观应严厉批评和热切鼓励下，表示愿意建设暹罗当局联合起来以抵抗法国侵略者。后来，越南虽被法国占领，郑观应仍积极往返于新加坡槟榔屿、西贡等地，为联合抗敌而奔走，但终于未能实现预定的计划。尽管目的未达到，郑观应的冒险救国的精神，却是值得称赞的。

他还不断地上条陈、提建议，为抗法战争贡献力量。首先是关于重视和整理琼州防务的主张。他认为法国侵略者之所以万里迢迢敢来侵犯中国，所依持的是中邻近的土地。如果说南洋一些地方是法国人的根据地，那末琼州则是它窥伺中国的重要桥梁。法国侵略者已对琼州垂涎已久，中国须立即加紧那里的防务整顿。琼州森林矿产丰富，应招商集股开采，采取“奖励引诱”的方法，将森林矿产开采出来销售，一方面利国利民，且免于外国人的掠夺，另一方面，可改善当地黎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使其成为巩固边防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广练民团以御外侮。他在 70 年代看到边疆危机日深，认为举办民团以御外侮是很可行的办法。郑观应的民团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寓兵于农，而且学习了其办法，扩展到寓兵于工商贾，对民兵进行严格的军事

和政治训练，做到“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声势相应，休戚相关”。中法战争期间，他将理论运用实践，分析当前的危机形势，认为强敌已于四周压境，单靠国家防军是远远不够应付敌人的，必须立即招集各省之民，选将才，练民团，授以武器，以补充兵力之不足。

第三、关于培养军事人才和军事部署的建议。中法战争之初，郑观应即建议设立水陆军学堂。他认为中国武备有两个缺点：一是到西洋学军事之人，虽然饱学军事之道，然未必可以使用；二是弹药船械的制造和购买均依靠国外，太容易受人牵制。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西洋人培养人才的方法，于沿海适当地方设一水师学堂，各省设一所陆军学堂，聘请英、德、美、法等国有名的、对我国兵强国富事业热心而愿尽心教授的人为师。至于器械等军备问题，须赶快设厂自造，但必须真正请精通技艺的人主持工作，以免误国。

郑观应不仅是一系列抗法措施的积极建议者，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1884年秋，他刚从南洋回到广东不久，法军开始大力攻掠台湾，他被委派办理援台事宜。他的主要工作是办理转运事宜，即利用他与中外商人的关系，到香港租轮船运军队、运粮饷，以便有效地接济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为了信息灵通，避开法国轮船的阻挠，他还以港商的名义租外国轮船，除装载客货往来于香港、琼州、廉州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军事上通信息和装载器械的需要，与此同时，郑观应还曾向彭玉麟请求亲自带兵千人，以作为牵制敌人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郑观应的爱国之心和具体的救国之行为。

当郑观应经营轮船招商局步步致胜，以期在商战中与帝国主义一争高低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吞并朝鲜，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中国运兵船，从此，中日之间进行了持续9个月的战争。郑观应本着一腔爱国之血，始终抱着积极的抵抗态度。他上条陈，提建议，随时随地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发展。1894年10月，他上奏盛宣怀的《管见十条》，系统地反映了他积极抗战、保卫祖国的思想。

第一、严防奸细。战争之初，郑观应看到日本特务活动猖獗。8月1日，中日宣战后的几天，他根据飞鲸轮买办的报告，向盛宣怀详述日本奸细活动的情况。其中说到中国地方当局不但听任其自由活动、四处刺探我军情报，即使万一被查，也对其处理日本奸细过宽。如有些日本奸细，混迹城市，或做小生意，或理发、做衙门仆从，在进行刺探军事秘密等非法活动中被捕，处理办法竟然是交回本国领事馆罚款一元五角就当场释放，而与日本人同谋的中国人也随即释放。如此，奸细胆子愈来愈大，对我国战事极为不利。为了提醒中国官民国际上不容外奸活动，郑观应还将《万国公法》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八节——《公法便览》和《公法会通》中的有关部分，汇刻成册，送至官府和商人，让大家了解公法条文，不致被外国人轻视我对此无知。公法对当时一个弱国来讲虽然未必能起多大作用，但却可以看出郑观应关心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的爱国精神。

第二、严密控制电报不准为日本人服务。他知道对外国在中国的电报局难以干预、控制，但中国自己办的电报局则应严密控制。他还奏请清政府传谕中国电报局：严戒不得与日本人往来，为日本人打电报及泄露电报给日本人。各局总办应派人密查，如有人违犯，即照军法从事，不能稍为姑息。

第三、从日本来的船只不准进入中国港口，中国人也不能买日本商品。这样，一方面可防止日本奸细混入，为其军队购买米粮等物资，同时也可禁止日本商品进口。日本全靠商业税收来维持战争费用。我们不用他们的产品，不与其通商，可以让其银根紧缩，挫其锐气。

第四、严密监视日本兵船活动和扣留换用别国旗的日本船。长江口是日本人注意的地方，中国除派兵船不停巡逻外，还应委派人员在各处登高台守望，如有日本兵船到近处海面，即行通知吴淞、上海等地提高防备。对日本的轮船，要时刻注意它换用别国国旗，在其它国的掩护下进行非法军事活动。

第五、用招商局船为战争服务。他看到战争中轮船使用频繁，在战争之初即主张把招商局轮船拨给官用。

第六、他在战争之初得知日本拟向外国借款 5000 万元，购买大铁舰 4 只，水雷船 20 只，便建议中国应像日本一样，向外国借款 5000 万元，多购买一些铁舰、快船、水雷船、枪炮，以增加自己的实力。他还利用与中外人士有广泛交往的各种关系，尽力为抗战服务。在开战之前，他即将日本增兵的消息报告清政府。有一次向盛宣怀报告说：日本有一轮船改名细普渡，由外国装满军械，约 8 月 17 日路经新加坡，请求清政府派兵截止，夺为己用。当时外间谣传日本有兵四五十万之多，海军兵舰如何多强时，郑观应作了细致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盛宣怀。他调查到的情况是：日方大小军舰如扶桑、吉野、高千穗共计 38 艘，并不比中国强多少，而兵力则远不如中国。他分析道，日本平时养兵 56640 名，有军务时可调兵 245310 名，另御林军 5400 名。所谓日本有兵四五十万，都是虚作声势，不足信。这些对于消除畏日情绪，提高士气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他还积极主张操办民团。早在中法战争中就曾提出以练民团来补兵力不足。到 90 年代初，中国的边疆危机更严重，他办民团的思想也更急迫。他说，英、法在缅甸和越南，俄国在西伯利亚修筑铁路，列强窥视祖国疆土之心、武力征服中国之行已不容忽视，为保家卫国，操办练民团则更是刻不容缓之事。甲午战争期间，当 1895 年初日本进攻威海一带之际，他奏请清政府在沿海特别是在江南富庶地区尽快操办民团。此外，他还担心台湾乃一孤岛，易攻难守，估计日本可能进攻台湾，建议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台湾“广办民团”，以备不测。从这些建议、措施中看，郑观应确是有远见之人。

第八、在政治上，郑观应还发出了赶快变法的呼吁。他在详细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性和一致性，以及国内经济和军事败退的形势后指出，无论与外国以何种方式议和，我国都不会再有高枕无忧之日。因此，我国应参照日本的变法，迅速作出变法救国的决议。出榜招贤，申明赏罚；仿

照西欧军制，选定民团章程，就地练兵；建设工厂，多造枪炮，免去被外人挟制，多借外资，振兴实业；广办学校，培养人才。

这些主张、建议都是郑观应本着爱国之心、救国之切，在观察分析敌我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确有远见且意义深邃的。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外国侵略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侵略从未间断过，要在每一时期、每一件事上都做到时时维护民族利益，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方针、建议是极不容易的，而郑观应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 八、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的政治态度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增强。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通过对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和争夺中国铁路投资权、投资中国矿山、在华开设工厂等方式向中国大量输入资本，形成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清政府为了能够转危为安，一方面幻想通过联俄来制约其他列强，一方面也试图做一些改革。改革的措施大致有：编练新军；整顿关税、厘金、盐课，增加烟、酒、糖、茶、盐税和各种苛捐杂税；发行“昭信股票”1亿两；允许民间办工厂。这些措施，尤其是允许民间开设工厂，进一步激发了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新式企业的积极性。而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对华输入资本，又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并作为新的政治力量，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于1898年领导了以救亡图存，改革变法的戊戌维新运动。

然而，对于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郑观应的态度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消极的。这里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郑观应是最早明确提出在中国设立议政制度的人，也是在甲午战前要求设立议院实行立宪制最激烈的人，当改良主义从一种思潮变为政治运动的时候，他理应积极响应但实际却不是这样。

政治运动之初，郑观应对于维新运动的政治实践是同情的。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短兵相接后，郑观应开始对运动泼冷水了。在1898年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之前，康曾问计于郑说，变法是否能进行？郑观应答道，欲速则不达，现在恐怕大局仍不成熟。例如大拇指与小拇指欲举重，而食指、中指、无名指不相扶助能成功吗？也就是说单依靠一个皇帝，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头尾之间要有大批的中间力量才行。郑观应的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问题在于，他既看出了问题，又不积极参加活动，也不打算帮助康有为去联络和发展中层力量以解决他所看出的严重问题，相反地却袖手旁观甚至在背后进行讽刺挖苦。

郑观应对戊戌变法的消极立场，还表现在对待一些维新事业的态度上。正当维新运动走向高潮时，沪商经元善等提倡创办女学堂，以作为变法维新一个组成部分。当捐款筹集到郑观应门下时，他却以“穷得很”三字来应付。郑观应在招商局每年有年金9000余两，加上花红和其他股金利息等，收入是很可观的。岂有捐助不起200元钱之理？

然而，郑观应毕竟还是有救国之心的，对政变的受难者还是报以同情的态度，政变失败后，康有为出走日本，他认为康有为由于救国而“获罪”，

于政变后不几天即送银 100 元与康有为的父亲作为生活费。对康有为仍在上海的弟子，他本着“为救才起见”，也规劝他们离开上海。

戊戌政变后，郑观应对于立宪却逐渐积极起来了。到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他急于要实行议院制度，想把人民统一在清政府之下。这主要是为了御外侮，但也是为了对付义和团。他错误的认为义和团“暴动”乃是“国耻”，并说都是由于义和团“烧教堂”、“杀公使”，才使八国联军乘势而入。因此，他对义和团是仇视、厌恶的。但他又认为，义和团对清王朝不是主要祸患，帝国主义才是国家最可怕的威胁。

他在义和团时期突然热衷于立宪，是因为盛宣怀在积极策划“变法”。在他的心目中，能把维新立宪办成功的人是盛宣怀，而不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盛宣怀在 70 年代以来，即大办煤矿、冶铁、纺织、轮船、电报、银行等近代型企业。在郑观应看来，这些企业都实现了他在《易言》、《盛世危言》中所提出的主张，都是朝立宪变法的路上走着的。

盛宣怀所谈的变法有立宪的内容。他在甲午战争时期所谈的变法，只变户政、兵政、工政，对于吏政、礼政、刑政 都不更改，而且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到 1896 年盛宣怀所奏的《变法自强疏》，也只谈到练兵、理财、育才三大项，以及开银行、办工厂等，对于立宪并没有触及。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期间，盛宣怀又开始大谈变法，但又不清楚首先应该变什么，于是去请问郑观应，郑毫不犹豫地说，变法应以设议院、立宪法为首要步骤。他还认识到，中国的病根在于没有民主。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人民虽有很好的意见和举动，只要与政府意见不同，一定会被认为是目中无上，叛逆无赦。而大小官吏也只能印承上方意志办事，不敢稍越雷池一步。这样统治，人心怎能不散！而且，专制而无民主，是奸臣弄权庸臣误国的祸根。这些认识是何等深刻啊！它清楚地反映了郑观应痛恨专制主义、憧憬民主的可贵思想和精神。这只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热情的人，才能说得出口，才敢书写于书中。

## 九、反对袁世凯控制招、电二局

1901年权重朝野的李鸿章逝世，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自1896年受命小站练兵以来，积极收罗党羽，扩充实力，但由于地位不高，经费不足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一直发迹不快。但通过出卖维新派和在山东等地残杀义和团，以及慈禧西逃回鸾时的“保驾”等“功绩”，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和信任，官阶扶摇直上，终于在1901年继承了李鸿章的地位。他一上台，就看准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财神爷。控制这两上据点，就可以为他扩大北洋实力提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源，所以他非把它们从盛宣怀手里夺归自己不可。1902年10月，盛宣怀之父盛康病死，他照例请开去本兼各职，以便安心“守制”。清政府除保留他铁路督办一职外，其他都准予开缺。袁世凯乘机上书清政府，请将招、电二局归北洋督办。

盛宣怀心里明白招、电二局收归北洋管辖，是势在必行的。盛与袁的矛盾集中在商办还是官办的问题上，而这主要表现在电报局上。轮船招商局商办官督，收归北洋后只换一个督办，表面上看，盛、袁分歧不太大。至于电报局，袁世凯一定要收归官办，盛宣怀坚持商办，其理由是，当外敌入侵之时官线敌人必定派兵占领，商线则可以照常通电。其次，商办电报可以用商力抵制外国侵犯权利。1870年总理衙门奏准洋线可以由香港沿各海口设至天津。英国人就此规定于1882年设电线至福州口，并将设至上海，且另设陆线至广东。沙俄也企图越界设线。当时就是以“商力坚拒”，才避免了权利的旁落外人之手。

盛宣怀以商民代表和维护商民利益自居，说官办就是抢夺商利。20年来众商人竭尽全力创办的招商局的利益是不容轻夺的。前10年商业年息极底，后10年所赚余利又用作本钱致使商人们赢利更少。至此情况不同了，利高息厚，又用不着都拿来作本钱，此时若再给官府夺去，就是在抢夺商人的利益。如果袁世凯一定要收回官办，那必须以原利返还商人，即按股票市价另加利息给予补偿。

与郑观应一生利益联系最密切的人是盛宣怀，郑、盛二人利益联系最密切的主要就是这两个近代型企业，而尤其是轮船招商局。正当盛宣怀为招、电二局与袁世凯进行激烈争夺战的时候，郑观应到广西巡抚王之春那里做官去了。但在远离招商局的几年里，他还是时刻关心它的动态的，并积极参与了争夺战的最后较量。

电报局、招商局自1903年初被袁世凯控制以后，实际上变成了“商本官办”。盛宣怀不甘心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奉送，时时刻刻都梦想着夺回来。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靠逢迎慈禧起家的袁世凯被撵回河南老家“养病”（养病之意）。被袁世凯撵走的盛宣怀，终于看到了袁世凯被清政府所抛弃。于是积极着手夺回招商局的权力，急召闲居在澳门的郑观应回来。1909年5月4日，郑观应乘船赴上海，又开始参与离开6年之久的

招商局的工作，这时他已经 67 岁了。

他到上海之后几天，就献计献策，并付诸实践。首先设立了招商局股东挂号处于上海四马路，以挂号处名义刊登广告，请股东携股票或息折去挂号处登记，声明挂号的股票超过半数即召开股东大会，以便按照商律组织商办。挂号处实际上起到了了解情况争取支持的作用。不到两个月，上海一地股商持验票折挂号的人达 24000 余股，郑观应个人 275 股，亲友托他代为验票的达 3000 股之多。到 1909 年 5 月底止，已得全部股份的 60%，超过了他的预期目标。众商人决定于 1909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织商办章程，并作“注册立案”等事，会上选举了郑观应、盛宣怀、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 9 人为第一任董事。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 46 条。这样，招商局又成为商办之局了。

盛宣怀与郑观应力争将商局、电报局归为商办，本是出于谋求个人私利。但二局归为商办，不但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准备了一定的有利因素，保证民族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壮大的民族经济来抵御外国侵略，维持国家主权。中国封建王朝腐败没落，让官府来经营近代型企业，无疑是将其逼上绝路，夭折刚刚发展不久的民族资本主义。

## 十、对待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的态度

随着郑观应认识到并坚信要使中国富强，必须改革政治，即将君主专制变成君主立宪，他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愿望比以前更加迫切了。然而，戊戌政变的失败，表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可能性极小，改良之路是行不通的。郑观应为了保证实业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壮大而迫切要求尽快召开国会以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民主革命运动高涨，已经把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提到意识日程的条件下，他的要求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国内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清政府于1901年陆续推行“新政”。1905年，又派载洋、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各国“考察政治”，表示考虑实行宪政问题。1906年，五大臣先后归国，说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宪政。经过一番争议之后，清政府于9月间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郑观应同其他立宪分子一样，迫切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以奕 为首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大权全部集中在皇亲国戚手中，汉族大官僚被排斥在一边，立宪运动失败了。这表明清王朝根本无意实行立宪制度，“预备立宪”只不过是个骗局。

皇族内阁为了获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9日，以“上谕”（即皇帝诏书）的形式宣布把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随即和英、美、法、德4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粤汉、川汉铁路所在的四川、广东、湖南、湖北四省的保路风潮。

作为粤汉铁路董事、且曾任总办并为之尽力引资的郑观应，却持着错误的态度，他首先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强敌压迫，只有国有化，才能加快工程速度，所以铁路国有不是出卖权利，而是爱国行动。既要加快工程进度，必定增加资本投入，就势必会借洋款。他还抵毁人民群众的革命行为，说保路风潮是“暴动”，是被“狂妄之徒”所利诱。如果保路风潮引起外国干涉，人民要负完全的责任。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倒没有看到郑观应明确反对共和的言论。郑观应所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的基本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本质上有其一致性。他们共同拥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富强救国的愿望和行动，共同反对和企图消除封建专制独裁，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不同的是实行民主制度究竟是通过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彼此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郑观应民国初年的言论来看，他仍憧憬着君主立宪，但也不是坚决反对共和制，而对于袁世凯等一批军阀官僚政客的反动统治却是

疾恶如仇坚决反对的。

袁世凯一死，继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议员贿选等一幕幕丑剧的上演，更加引起郑观应的愤怒和仇怨。这时他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认识也比过去有所提高。他认为连年以来，直皖战争、滇桂战争、南北战争一系列没有尽头的混战会造成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局面，中国人内耗殆尽，帝国主义趁机轻而易举地获得利益，扩大侵略，军阀混战是会造成国家的灭亡。为了进行这害国害民的战争，军阀恣意搜刮，冗员糜费，兵饷官粮，搞得民穷财尽，民众遍受战争之苦，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民不聊生。这些使郑观应忧国忧民的心清溢于言表。

## 十一、热衷教育与医学的晚年生活

辛亥革命以后，郑观应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没有过去那样充沛的精力和活动能力了。他除了在轮船招商局中做一点工作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教育，而主要的教育活动又是围绕着招商局所需要的人才进行的，他担任了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

在最后的 10 多年时间里，他在经济方面的言论和活动相对地减少了，而在教育方面的言论则逐渐增加。这时的郑观应，很像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把教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它看作是实现富强的一个重要手段。他重复几十年的“兵战不如商战”的观点，认为商战的人才，都是出自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维系着国运的盛衰。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却是“有名无实”，很少能培养出有用人才。因此，中国不富强则已，如果想要富强，则必须效法日本先抓学校，先从教育入手不可。

但郑观应和当时提倡教育的人不同，在把旧学抬到很高位置上的同时，认为学习现代技术也很重要，而且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把学习驾驶技术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他说，航业乃国家之命脉；航学是航业的桥梁。为国富民强，防止商利被外国入侵掠，航业必须大力扩展，要发展航业，必须大力培养服务人才。他还盛赞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招商公学，把它提高到商局的“根本之图”和“为国家富强之助”的地位，并展望未来说：“他日人才辈出，乘长风，破万里波，与欧船美舰并驱争先，为我航业放一异彩。”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郑观应少年时代就身体不好，壮年以后疾病更多。他患过肺结核，尤其是哮喘病长期折磨着他。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他少年就开始学习医学，几十年来，在忧国忧民、举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业余爱好医学。经过多年努力，辑成了《中外卫生要旨》一书。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为中西医合璧，取长补短地进行治疗比较有效。用西医的科学方法，来验证中医的合理性；用中医的长处，补西医之不足。在当时，提出中西医“弃短补长，中西合璧”主张的，还没有第二个人。郑观应对于中西医合璧的主张不仅是他一生思想开明的又一证明，而且也说明他有较深的医学造诣。这也是他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

到郑观应年过古稀，身体更加不如以前，各种疾病特别是哮喘病使他的生命受到威胁。1914 年，73 岁的郑观应病情加剧，家属也为之不安。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准备后事，写了遗嘱的定稿，并再次提出辞职养病。

在 1921 年 5 月 28 日的股东常会上，郑观应又被选为留任董事，但 80 高龄的他确实是又老又病，决心辞退了，遂写了长篇辞职书。这时，他最亲密的老朋友盛宣怀已死去 3 年了，自然也不会有哪一位坚决挽留他。1922 年 5 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的招商公学宿舍内二楼，终年 81 岁。死后，招商公学停课 3 周，出殡至联谊山庄，仪式很隆重，是按清朝道台的仪节

出殡的。1923年夏天，郑观应的三子郑润 护送灵柩回乡，葬于澳门前山。

郑观应于1858年到上海学商，到1922年去世，经营商务达60多年之久。除独资开设过揽载行之类的商务机构外，没有独立开设过一家工厂，却是很多厂矿企业的股东。他所经营的无论是商务机构，还是近代型企业，都是当时一流水平。而且许多都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对立物出现的，并争夺回一定的权利，由此可窥见他的商务能力和爱国思想的一斑。他富强救国的事业心是非常强烈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如何把企业经营好，通过“商战”最大限度地夺回被洋人侵占的权益；考虑如何把政治制度改革得适合于加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如何使中国致富致强体现于著述之中。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断加深的社会，郑几十年如一日地忠于自己的爱国信仰，坚持富强救国并付诸实践，身体力行，的确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值得我们大家尊敬、学习。

注：

**买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佣的当地管家。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佣的中国经理。“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承办人和管事人。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仍称买办。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

**子口半税：**旧中国海关征收的一种国内关税。凡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或出口土货从内地运销国外，除在口岸海关完纳值百抽五的进口税或出口税外，另缴2.5%的子口税，以代替沿途所经各内地关、卡应征的税、捐和厘金。当时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关卡在地为“子口”，因此把这种代替内地关、卡应征的各种捐税称“子口税”。1931年废止。

**厘金：**亦称“厘捐”或厘金税，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主要是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1853年开始实行。当时清政府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初在扬州仙女镇（今江都县江都镇）设厘金所，对该地米市课以1%的捐税。1%为1厘，故称“厘金”。以后各省相继仿行，遍及全国，不仅名目繁多（如坐厘、货厘、统税、统捐、产捐税、落地税、山海捐、铁路货捐等）税率亦极不一致，且不限于百分之一，成为反动政权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1931年裁撤厘金。

**总办、督办、帮办、会办：**清代后期，中央及地方都有临时设置的机构，其主管官称督办或总办，副职称会办，资格比会办略次的称帮办。

**昭信股票：**清政府为偿付对日赔款而举借的内债，也是旧中国最早发行的公债。1898年发行。总额库平银1万万两，年息5厘，以田赋、盐税为担保，前10年只付息，后10年本息并付，20年还清。募集集款10万两以上的人，由各省报请给奖。业务由户部设昭信局、各省设分局办理。所募债

款有限，流弊很多，受舆论抨击。当年9月，清政府被迫下令，除已认定款约2000万照收，官员仍准请领外，民间停办。

户、兵、工、吏、礼、刑：从隋唐开始，中央行政机构设户、兵、工、吏、礼、刑六部。其中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兵部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工部掌管全国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礼部管理礼仪、祭享、贡举等职；刑部掌管全国的法律、刑狱事务。

守制：即守孝。旧时值父母或祖父母之丧，子与承重孙（长房长孙）须谢绝人事，做官的解除职务，在家守孝20个月。意指遵守居丧的制度。

道台：通员的别称。清乾隆时设分守、分巡道，多兼兵备衔，管辖府、州，成为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

